

直探本源的理论品位，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

——评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版)

彭红卫

摘要：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版)是一本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主要表现在作者队伍的层次较高，具有直探本源的理论品位和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

关键词：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版)；作者队伍；理论品位；实践特征

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2003年初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印，2006年又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7年1月修订后改为新版。新版的体例更完善，内容更丰富，教学更实用，开本更大气，篇幅也由原来的35万余字增至41万余字。综观全书，它有如下鲜明特色。

一. 作者队伍的层次较高

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建设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相对滞后。自1982年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问世以来，先后有吴枫、王欣夫、洪湛侯、熊笃、许廷桂、杜泽逊等学者主编或独撰的教材推出，他们对提高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质量和培养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合格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上述诸家相比，张三夕教授主编的这本教材首要特色是合作编写，作者队伍的层次较高，依靠集体智慧，很好地保证了这本教材的特色和质量。

本教材的编写者都是“术业有专攻”的教授，几乎全是博士生导师，他们在文献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张三夕教授是我国著名文献学家程千帆和张舜徽二位先生的高足，长期致力于文史哲研究，以文学思想史研究见长，有多种专著问世。何新文教授长期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目录学课程，2001年在江苏教

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王齐洲教授侧重中国文学史学和小说史研究，他利用文献学来研究小说史问题，成绩斐然，对20世纪文学史文献和观念有很精到的研究。徐有富教授除了与程千帆先生合著《校雠广义》(目录编、版本编、校勘编和典藏编)外，还于1992年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他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科学》。曹书杰教授长期致力于辨伪学和辑佚学的教学与研究，199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我国第一部辑佚学专著《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王问靖教授早年师从石声淮先生学习和研究文献学，长期从事先秦至唐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孝文化”方面颇有研究。高华平教授在先秦两汉六朝文学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尤其关注佛教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研究。王兆鹏教授是宋词大家唐圭璋先生的门生，他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宋词和文学史别具一格，对各种古籍的电子文献检索系统的利用尤其娴熟。

在本教材的编撰和修订过程中，这些参编者不仅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心得提炼或融入相关章节中，悉心推敲，精心结撰，而且经常相互探讨一些文献学教学和研究的课题，还多次和出版社编辑一起讨论教材的修订。这种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有效地保证了这本教材的高质量和鲜明个性。

二. 直探本源的理论品位

理论性是学术专著的底色和生命力所在。教材不同于学术专著，作为该学科基础知识的载体，其首务

收稿日期：2007-11-05

作者简介：彭红卫(1966—)，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必须陈述其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但教材也是人类认知过程的载体,因而它仍然要以理论为先导,在教材体系上揭示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教材内容上反映最新的理论成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这本教材具有直探本源的理论品位。

首先,在教材体系上严谨缜密,体大思精。

全书由导论和以下依次展开的十章组成: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和出土文献的整理。其中,导论和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是介绍古典文献学的一般原理和知识。目录、版本、校勘是古典文献学的三大主干知识,“主要解决文献著录的类别性及文献自身形态(如物质形态、文字篇章等)的可靠性问题”(第6页,见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标示页码)。辨伪“则侧重于解决文献的作者及其所属时代的真实性问题”(第6页),辑佚侧重于解决文献的完整性问题,辨伪和辑佚是乾嘉考据学者壮大并使之成熟的两门学问,它们和目录、版本、校勘一起,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五大分支,因而编者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编排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果说前面几个方面的内容涉及的是文献自身问题、作者问题,那么标点、注译和检索涉及的是读者问题。标点断句是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功,注释翻译是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二者都是整理文献的方式。检索包括对传统纸质文献和现代电子文献的检索,是为了读者有效、快捷地利用古典文献资源。标点、注译和检索这三个方面运用现代传播学理论,将涉及读者阅读的三个领域纳入教材体系,揭示了它们与其他领域的逻辑关联,这是极有创建性的。现代考古学出土文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传世文献,而且它们和传世文献的结合形成了20世纪以来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印证或解决了过去单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印证或解决的问题”(第8页),这就为出土文献在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争取了合法地位,所以教材最后一章就出土文献的类别,包括甲骨文、金石、简帛、敦煌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作了较大篇幅的介绍。

毫无疑问,主编者的这种教材体系的构建既吸收了中国历代文献学积淀下来的优秀成果,体现了对历史本源和学统的尊重,又从其师从的张舜徽、程千帆两位文献学先驱那里获得了较多的启发,并能结合文献学发展的现状有所超越,在这种精到的转身中,完成了学脉的延续和对开拓者的尊重。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在“校讎学”的

名称下,以书为研究中心,以典籍源流为重点,逐步从形式涉入内容,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催生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五大分支学问。由于缺乏理论支撑,由这五大分支构成的中国传统文献学还缺乏内在的结构逻辑,彼此之间畛域模糊,对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文献学史缺乏理论自觉。

从20世纪初期开始,新一代学者如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方面继承了清代学者的崇实热情,另一方面又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古典文献研究增添了学术活力。

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其中,张舜徽和程千帆二位大师居功至伟。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构建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体系、思想和方法,堪称中国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开山之作。张先生第一次明确阐明了文献学的目的、对象、范围、基本要求和任务。他认为,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要研究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也要研究出土文献,要对他们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并且进一步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程千帆先生在传统“校讎学”名称下展开对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他把这门学问称为“治书之学”,包含版本、目录、校勘和典藏四个部分,在版本、目录、校勘这三大主干知识之外,又加上了典藏之学,并和徐有富先生共同撰写了《校讎广义》,对这四个分支领域作了最翔实的论述。尤其是程先生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熟练地运用到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之中,使中国古典文献学获得了崭新的生命。

这本教材吸取了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为核心的思想,在局部跳出了以书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在“史”的叙述中,以人为中心,总结历代文献学家的成就,如导论部分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一节、第五章对辨伪活动历史以及第六章对辑佚活动历史的论述,均能在历史演变中体现出对古代文献学家的总体把握。同时,它又强化了标点、注译、电子文献检索和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

其次,在教材内容上理论蕴含丰富,及时反映了学科最新的理论成果。

如果说教材体系上的严谨缜密,体大思精隐性地反映了主编者科学的文献学观和理论思维的话,那么在各章节内容的撰写上,则蕴含着各位参编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

为了学生便于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总体风貌及其演变的趋势和特征,主编在新版中增加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一节。在将中国古典文献学分为四个阶段叙述之后,对各种分期进行了评述,并且参照王齐洲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将中国文学发展分为贵族文学时代、精英文学时代、市民文学时代、大众文学时代的四分法,提出了“我们也可以根据文献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变化,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分为贵族文献时代、精英文献时代、市民文献时代、大众文献时代”(第41页),这就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期视角。这种纵向的“时间叙事”方式一旦和横向的“空间叙事”有机结合,便会结晶出规律性的理论成果,这一点在第五、六两章论述辨伪和辑佚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编者在论及辨伪的意义时指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首先是时间概念的限定,其次是空间概念的限定,再次是个体概念的限定,时间线段、空间方位、个体体现这三者间的不断变化就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这三者的规定性也就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而伪书所模糊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年代、个体——作者,而某一特定的个体同时就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意义。”(第177~178页)从历史文化视野来审视古典文献学的具体门类,占据着理论的制高点,因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伪书是古典文献中普遍存在且具有存在价值的文化现象,它种类繁多,产生的原因也比较复杂多样,历代学者对古书辨伪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也多有论述,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考辨伪书的方法,产生了大量文献辨伪的经典著述,逐渐形成了辨伪学的理论体系,这些内容构成了编者对辨伪学的横向叙述。在此基础上,编者在第三节中展开了对辨伪活动历史的叙述,认为中国古典文献的辨伪活动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早期辨伪工作、唐宋辨伪的成就、明清辨伪的成熟、现代辨伪的特征和当代辨伪的发展。显然编者试图勾勒一条线索清晰、内在逻辑分明的中国辨伪学史。这种努力是成功的。有了前面横向的铺垫,在纵向梳理中便更容易确立某个时期或某个学者在辨伪学史上的坐标位置。编者认为,辨伪成熟的标志性著作是晚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它“第一次把古籍文献的辨伪工作做了方法论的概括,使之具有形而上的形态”,“清代是辨伪理性化、规模化发展时期”(第190~191页),明清学者共同把中国古代辨伪学推向成熟的发展轨道。现代辨伪学是中国辨伪学转型的时期,它在中西碰撞融合的背景下发展,一大批既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有深厚的理论素养的学者加入到辨伪工作

中,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性派和以张心澂为代表的目录学派。其中,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是一部理论体系和方法完备的著作,对当代辨伪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代辨伪学在1978年以来的20多年间,“辨伪学得以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的辨伪工作更加客观严谨,二是辨伪学的学科建设日渐完善,三是辨伪学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第193页)这种对辨伪学史的宏观把握是科学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辨伪学发展的规律及其时代特征,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辨伪学。

在第六章讨论辑佚时同样贯彻了这种理论思维。由于编者曹书杰先生在该领域研究有年,所以对内容驾轻就熟,在历代文献的散佚、佚文献的类别、文献亡佚的原因、辑佚工作的标准、辑佚工作的程序、辑佚的知识准备、辑佚的基本方法和历代辑佚工作的基本状况等内容中都充分吸收了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并在教材中得到了提纲挈领式的体现,更能体现自己的学术精髓。

三.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和出土文献的整理等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无不依赖人的实践活动。虽然目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建设仍然薄弱,我们需要加强理论建设,但是研究的灵感来自文献本身,我们必须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来整理文献,并逐步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而不是依傍某种现成的理论来展开研究,也不是用实证去证实某种现成的理论。理论和实践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理论付诸实践才有效用,没有实践支撑的理论也就没有生命力。因此,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建设,必须立足于传统,体现学科的实践性特征。

在立足于传统的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建设和其他学科的一样,必须面向现代。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吸收现代教育思想,遵循教育的规律,贴近教育的本质,二是要面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在现代教育思想中,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健全人格是其根本目标。而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又要求我们处理好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的关系,做到既梳理知识又训练技能,将知识点和技能点有效融合,形成全新的课程结构,从而为学生提供某种可以谋生的知识和技能体系。

张三夕教授主编的这本教材,可以说既立足于传

统,又面向现代的教材,真正做到了把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相结合,是一部理论含量高又具有实践品格的教材。

首先,在教材体例上的创新,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多元化培养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编者在每一章正文之后,都安排有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和进一步阅读文献四个方面的内容,并以繁体排版。关键词是为了突出每一章的重要概念。原则上,每个关键词在教材正文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也有少量的关键词留待师生补充。对关键词的掌握,有助于培养学生缜密的思维习惯。思考题是对每一章重要知识点的概括,有助于学生掌握起码的课程知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安排,旨在提示学生掌握该章的基本知识。练习题则集中体现了编者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师生互动的教学观念。举例来说,第二章有关目录学的练习题主要是要求学生课外去翻检或阅读典藏图书目录,如《四库提要》等,第四章有关校勘学的练习题列出了若干个需要校正的诗文材料,第七章有关标点的练习题有一道是要求老师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打印一部唐宋笔记小说发给学生标点,每个学生分几页,最后老师点评。这些题目都紧紧围绕课程内容来精心设计,形式多样、力避重复,既对应着课程的知识要点,又希望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来增加他们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对古典文献的认知能力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能力,并力图体现师生互动的现代教育观念。进一步阅读文献是为了拓展和加深该章的知识内容,以供对该领域有兴趣的学生课外阅读。它一般是相关领域的名著和最新学术论文,都有简明扼要的内容提要。这部分内容体现了多元化教育培养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

其次,在教材理念上突出了方法和应用,体现了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向大众型、技能型人才转变的教育方向。

第一,突出地将标点、注译和检索这三类大众应用型知识纳入教材之中。标点、注释、翻译和检索,是本科生和普通读者阅读和利用古典文献时遭遇到的最直接的问题,它关系到古典文献的基本效用。但是,也许是出于学术旨趣的考虑,许多同类教材至多在注释和大型类书、工具书利用上作一些基本介绍,而本教材对这些大众应用型知识作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精要的叙述。在标点部分,除了介绍古籍的句读和现代新式标点规则外,重点分析了古籍标点致误的原因,介绍了一些标点古籍的主要方法。在注释和翻译部分,除了介绍注释的内容及其源流、古文今译的

标准、方法和要求外,着重介绍了古籍注释的名类及其术语。编者采用定义和例释相结合的方法,对古籍注释最常见的传、注、说、故、训、解、笺、记、论和释、微、隐、章句、集解、义疏、疏和正义、音义、直解等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最后影印《十三经注疏》中《诗经·秦风·蒹葭》里的首章来讲述序、正文、传、笺、疏的形式,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在检索部分,除了介绍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方法与途径外,突出介绍了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在电子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电子文献是学生和普通读者经常阅读和利用的文献,但是电子文献资源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文献工作者及时予以指导,推介一些资源优异而稳定性强的最新电子文献。为此,编者将古籍电子文献分为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两类进行介绍,对《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4版等大型光盘数据库和一些著名的古籍书目检索、古籍全文检索、古籍全文浏览网络数据库逐一介绍,列出网址,并讲述检索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可以说,这些不厌其烦的工作,为读者步入古籍的殿堂提供了最实用的钥匙。

第二,对每一类知识的叙述,突出了方法的介绍和技能的培养。

中国古典文献学既是材料的学问,也是方法的学问。就材料而言,文献学主要是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为人作嫁,服务于大众,也为其它相关研究者减省鉴别文献的烦劳,充分发挥古典文献的现实作用;就方法而言,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主干知识本身就是整理文献的方法,同时,这些方法本身也表述了一种学术观点,一种对古代学术文化的看法和主张,一种处理历史文化的技能。所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是纯客观的学问,它本身就是方法、观点和技能。应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界还缺乏这种对本学科原质的普遍认同,因而在教材编写中,未能普遍而有效地贯彻这种观念。本教材可以说在每一章都注重了方法的介绍和技能的培养。举凡目录学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版本的鉴别与选择,校勘、辨伪、辑佚、标点、今译、检索的方法以及应用事项等都有专节评介,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操作性强的实用技能。

总之,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教育教学思想、学术理论与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一本好的教材,应该具有较高的理论品位和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这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看,张三夕教授主编的这本教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责任编辑:刘兵)